

红色季风

咏慷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季风/咏慷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 - 80647 - 205 - 3

红... .咏...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702 号

书 名: 红色季风

作 者: 咏 慷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印刷厂

开 本: mm × mm 1/ 32

印 张:

字 数: 万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定 价: 元

ISBN 7 - 80647 - 205 - 3/ I·151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风萧萧	/ 6
1、1966,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 6
2、母校风云	/ 15
3、老前辈横遭毒打	/ 34
4、焦躁的大联合	/ 49
第二章 军训曲	/ 52
5、1967,到卫戍区请解放军	/ 52
6、陈伯达在师大附中讲:“你们能不能上课?”	/ 53
7、风雨台基厂——筹备中学红代会	/ 55
8、军训团进校	/ 60
9、满政委问:“有人反映你为彭真放毒?”	/ 64
10、满政委问:“有人反映你因读刘少奇‘黑修养’入的党?”	/ 66
11、一个“红卫兵”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 69
12、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 72
13、《解放军报》的文章使我一夜扬名	/ 74
14、英雄吕祥璧部队的来信	/ 76
15、四川农村来信	/ 78

16、中学分成“四·三”、“四·四”派	/ 80
17、尽力超脱于派性之外	/ 83
18、暗访驻外大使杨伯箴	/ 84
19、小“少尉”致信谢富治	/ 89
20、陈毅元帅之子来访	/ 90
21、徐向前元帅之子来访	/ 92
22、康生到师大附中	/ 94
23、满政委问我：“你现在有补贴吗？有女朋友吗？”	/ 96
第三章 雨纷纷	/ 99
24、见到毛泽东主席	/ 99
25、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 102
26、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 104
27、男同学杨星和女同学李燕伶	/ 106
28、伤痕种种	/ 108
29、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	/ 111
30、反对发表《红旗》杂志极左的“调查报告”	/ 113
31、南城月	/ 114
32、学习班与年四旺	/ 117
33、自发地恢复党组织	/ 119
34、创办《红卫兵报》	/ 121
35、厌倦和躲避	/ 124
36、黑龙江畔	/ 125
第四章 新兵谣	/ 130
37、应征入伍	/ 130
38、征途	/ 134
39、赛猪记	/ 139
40、第一次站岗	/ 141
41、“猪倌”	/ 147

42、战友	/ 151
43、返京行	/ 155
44、老兵	/ 164
45、“支农”	/ 169
46、盐碱滩上的突击队	/ 171
第五章 大起落	/ 179
47、成为军种的先进典型	/ 179
48、触犯“超天才”	/ 187
49、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冤假错案	/ 194
50、“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老红军	/ 196
51、重逢	/ 219
52、书与诗	/ 224
53、憧憬	/ 231
54、报纸风波	/ 236
55、苦茶	/ 238
56、袖珍型半导体收音机	/ 240
57、虐待	/ 242
58、“专案组”出了个强奸犯	/ 246
59、帐篷内的小姑娘	/ 248
60、逆境能唤醒蕴藏体内的力量	/ 253
61、不了了之	/ 261
第六章 路迢迢	/ 264
62、邂逅刘平平	/ 264
63、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 266
后记	/ 273

引子

这些事——
是永不泯灭的回忆
——菲尔德

自从《青春殇——1966年夏季开始的故事》历经坎坷，终于带着油墨的清香，走进或大或小的书店，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它就仿佛一把不大不小的石块撒进深潭，使我立即听到了一连串的回响：

一位“老三届”的普通读者，1999年年初在农展馆举行的图书订货会上，见到《青春殇》的样书，立刻兴奋地说：“就把这本样书卖给我吧！”

一位延安时期曾经给党中央主要领导当过秘书的老前辈，通过我的亲属捎话：“你的其他作品，我并不一定急着看，但这部《青春殇》一定要给我寄一本。”

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老校长、“三八式”的老教育家刘超在连夜读罢《青春殇》之后，很

激动地在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谈他自己的心得体会,还表示他是一边读《青春殇》,一边用作品中的内容对自己当年的教育工作实践进行对照、检验。

一位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告诉我,得到《青春殇》一书后,她不仅自己读,而且还介绍给儿女们读,同时要求他们读后要向自己谈谈读后感。

承蒙出版社同志的协助,我还在几个城市的许多家书店、书市搞了签名售书活动。

一位曾跟随第二野战军转战南北的老干部,在书店里一下就买了5本。她说:“我和老伴留一本,其它的一个子女给一本,让他们都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一位“老三届”的读者在书市上购买《青春殇》时,我问他想让我为他写句什么话,他爽朗地说:“你可能还不认识我,我可是早就认识你啊。你只要签上你的本名‘陈永康’三个字就够了。”

还有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老三届”读者,特意打听到地址给我来信:“希望你继续写下去。如果需要什么材料,可以随时到我们图书馆来查。”

不少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在买书时特别要我写上他们父母的名字:“我要把这本书赠给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那一段历史啊!”

还有一些外国籍读者,买到《青春殇》后表示将尽力将其译介到国外……

更有那一次次难忘的两代人对话——首先从我的母校开始,继而到其他一些学校和部队……事前我了解到,如今中学生和一些战士的父母,大多数是“老三届”或“老三届”前后,即刚过“不惑之年”、面临“知天命”的人。而“老三届”这代人,恰恰是“青春”气息一直很浓厚的一代。因此这些座谈或报告,实际上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流。

我不能不感到欣慰：因为我和现今的年轻人有共同点——我们这父子两代，即当年的“老青年”和现在的“小青年”，应当互相了解、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应当成为最好的知心朋友。对于年轻人来说，应当首先了解、理解自己的父母，并学习父母的长处，像他们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俭朴素的习惯、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怕困难的意志……对于现今年轻人的父母来说，则应当学习自己子女思想解放、接受新事物快、善于交往等长处……

同样使我很受鼓舞和激励的是，《青春殇》问世后，有几十家报刊作了报道，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一位出版界的朋友特意找到我。

“咏慷，我向你约稿，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好啊。”我漫不经心地应答道，“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嘛，即使你不说，我也要继续写下去的。否则，这些事不就白经历了呀！”

“但是我有个愿望，你在继续往下写时，最好暂且不要再用那种第三人称的小说写法。”

“为什么？”我反问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玉宝》等许多文学名著，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那朋友哑然失笑：“你可真是我们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啊！”他接着娓娓劝我，“在一般人看来，小说是虚构的，但凡是个作家都会编。而你曾经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磨难艰辛，伴随着共和国的步履，激扬过也失落过。你只需要把自己在那特殊年份中特殊的亲身经历的坎坷故事写出来，把你受到艰难困苦而矢志不渝、顽强与命运抗争的感受写出来，不用玩弄什么叙述花招，本身就比较小说还要生动。这可是你独有的呀！”

“话是这么个理儿。但眼下，我手头其他事太多，实在没有时间呀。还是到晚年再写吧！”

“不成！”那朋友们的应答十分干脆，“须知岁月无情。到了那

时候,最初那种创作激情,可能早已淡之渺渺。再说,写这种东西,一定要有一种力度,一种对生活的穿透力。心里没有一股气,怎么能够写出、写好?”

我不禁默然。

的确是岁月无情!

生活对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更是缺少厚爱。

转眼间,我们这代人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年龄。它警告我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很快就会像梦一样飘失

.....

还有些曾经读过我当年部分日记,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整党时有关回忆材料的编辑朋友,甚至更进一步说:“其实你那些无意为文时随手写下的东西,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只要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

于是,我终于坐到写字台前,打开记忆的闸门。

啊,往事,越来越清晰。它们排着队告诉我:是该立即接着写呀。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意料不到的事都会不少。但你自己的人生道路,更似乎是用一些反差很大的字眼作基石铺成的:欢笑、苦恼;顺境、逆境;阳光、阴霾;好运、厄运.....以纯真的政治生命力代价,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曲折与患难,可谓风吹雨淋,历尽沧桑,土地与心灵都曾耕种。这使我获得了一般作家不可能获得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也在颇大程度上框定了我不少作品的大致内容与基调。我赞成有些作家朋友看法:一个作家写什么和能写什么,往往并不取决于或者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冥冥中有一种所谓“天意”的东西在暗暗主宰。

其实,我们这整整一代人所跋涉的人生道路,几乎每一程都非比寻常。

正如一首小诗所说:

时间的药罐
不紧不慢地煎熬着人生
人生便有了
苦味

我蓦然被从心底涌出的如潮如浪令人激动遐想的思绪所震撼,忍不住想写下这生命燃烧的瞬间,而且是立即就写。

和写《青春殇》一样,我执著地要把《红色季风》写出来,无非是要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因为有不少人曾经错误地认为,当年的那些年轻人统统是只会盲目“造反”、打砸抢、搞破坏的土匪、群氓,只有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些影视作品中闪现过的那种简单化的模样,或近来一些人靠“自贱”、“展览丑恶”媚俗,才算“真实”。有些浅薄的评论家,也有意无意地朝这方面引导……然而,这却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此,作为在斗争漩涡中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刻意反映那种确实存在、而在过去却基本上没有得到如实反映、因而一般还不为人所了解的年轻人……人生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远未必 $1+1$ 就等于 2 。人所付出的与得到的往往不会等同,甚至可能只付出而没有得到。

那一段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令人难忘的年代,也是美好心灵的折光。温馨中夹杂着伤感,甜蜜中掺杂着苦涩。

孟德斯鸠有一段名言:“能将自己的生命寄于他人的记忆中,生命仿佛就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的生命,其可尊贵,实在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从想到了这一点时起,为了这一点小小的理想,我便开始了执著的苦苦追求。

但愿能通过我的作品交一些知心朋友,更希望我的这些作品能够流传,哪怕是在一定的范围和人群中流传。

第一章 风萧萧

温故而知新
——孔夫子

1、1966,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那时候,似乎全校只有办公室和传达室两部电话。一般学生用的都是传达室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25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

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中央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3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同学,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

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兵团”。

这是位于东城区鼓楼附近的一幢小楼，样式看来已相当古老，据说文化大革命前是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运动开始后，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这里也人去楼空，便被“首都兵团”借用为自己的“总部”。他们的人员常常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你看有意思不？连这个民主党派‘中央’的汽车司机，也戴上红袖章，加入我们‘首都兵团’啦！”

在“主席团筹备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李冬民。

他瘦瘦的，个子不高，口才似乎并不出众。但看得出他为人十分敦厚、诚恳，文思也比较敏捷。

同他一起操持会务的还有二中的高三学生刘龙江、二十五中的高三学生秦喜昌、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高三学生杨海峰……都是一些中学生卫兵运动中的相当活跃的积极分子。

从言谈话语中我渐渐发现，这几个人的特点各不相同。刘龙江直爽、幽默，语间常能迸出一点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秦喜昌麻利、干练，办起事来风风火火；杨海峰热情、乖巧，写出的讲话稿颇有一点文彩。

他们见到我都热情地跑过来握手：“早就听说过你，真是相见恨晚啊！”

筹备会主要是审阅第二天大会的发言。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中的代表通过揭批该校某些人私设“公堂”、“监狱”，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中的代表通过披露该校学生王光华被某些人残酷殴打致死，抨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几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到了午夜。

当所有发言都试讲通过后，李冬民客气地说：“最后还是请我

们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说吧！”

这时,我才发现会场上还坐着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

他谦虚地对大家说:“时候已经不早了。首长只是要我来了解一下你们会的准备情况,看看还有什么大的问题。你们就按照你们准备的进行吧!”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十年大庆”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

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总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

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

周家鼎同志和我的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同事。两家同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宿舍大院,因而可以说是很熟的邻居。

我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十分尊重地叫了一声“周叔叔”。

他也一眼就认出了我,便先和我亲切地攀谈了起来。

我说:“最近工作很忙吧?”

周家鼎说:“是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更忙一些。”

这时我才想起父亲曾对我说过,周家鼎同志现在已经不仅做军事秘书,而且开始担负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些领导工作。

周家鼎问我:“听说你前一段被整得很厉害?”

“是呀。”我点点头,并简要地把师大附中运动的情况向他讲了一下,还告诉他:“一会儿,我们学校有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他点了点头:“你爸爸最近身体好些了吧?”

我答:“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最近好些了。”

周家鼎说：“代问你爸爸好。”

这时，他发现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就要登上主席台了，便跟我打了个招呼，闪到了一边。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

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

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

我右边坐的是一位 50 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 50 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能两人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

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小声问：“老首长，您是广东人吧？”

他“嗯”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像。”我依旧用很低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祖籍也是广东。”

那老干部淡淡一笑。

没容我们两位“老乡”再说些什么，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已经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

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到：“在这个问题上，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

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

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躯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

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灌耳的怒气冲天的断喝:“低头!”

这场面,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所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工人体育馆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也便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我一句也听不懂。

好在他同时登上讲台的,还有一位高个子军人。陈伯达说一句,他翻译一句。

这种独特的演讲方式,倒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是王力。”我右侧的那位体态较胖的老军人主动低声告诉我:“每当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由他给我翻译。”

我把脸转向右侧,客气地点了点头:“您是……”

“我叫穆欣。”

“哦,久仰。”我说,“几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长篇传记《邹韬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位《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谦虚地说。